

历史事件篇

也谈 110 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

建国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从 1840 至 1919 年）和中国现代史（从 1919 至 1949 年）的分期问题，史学界几乎是进行了不停顿的研究和讨论，并发表了一大批颇有见地的学术论文。但是，把从 1840 到 1949 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来研究它的分期问题的文章却不多见。1989 年，夏东元先生在《历史研究》第 4 期上发表《110 年中国近代史应以戊戌变法为分段线——兼论中国近代史体系问题》（以下简称“夏文”）一文，令人欣喜。夏文理论精辟，材料翔实，功力深厚，既有冲破传统窠臼的勇气，又有开拓求索的新论。但笔者认为，夏文的某些具体论述和总体分期尚值商榷。下面，就夏文和 110 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谈点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夏东元先生和史学界同仁。

一、对夏文的三点不同看法

夏文以戊戌变法为 110 年中国近代史分段线的新论主要有三根支柱：一根是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一根是“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一根是戊戌变法“是为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即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 1949 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2 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和独立这一步”。这里，我们仅就这三个问题谈点不同看法。

（一）资本主义并不是贯穿 110 年中国近代史始终的“一条主线”。

夏文认为：在 110 年的中国近代史上，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外，其余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企业，都没有什么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之别，统统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从 1840 到 1860 年间，处于酝酿时期的资本主义并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夏文认为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条主线”。既然是“一条主线”，就无疑包括从 1840 到 1860 年的 20 年。那么，在这 20 年里，中国的资本主义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呢？毫无疑问，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大力量冲击下，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了。但这一时期的瓦解还仅仅处于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各种手工业部门衰落、农产品商品化发展的状态，取代封建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资本主义还没有出

现。因此，这一阶段，资本主义还仅仅处于酝酿时期。处于酝酿时期的资本主义只是一个未知数，它并不能体现历史发展的方向。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也不能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因为，中国早在明代中叶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西方地中海沿岸早在 13、14 世纪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却无人把它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因此，夏文的“一条主线”并不能统制鸦片战争后的头 20 年。

其次，从 1860 到 1895 年间，从顽石缝里生长出来的已经被扭曲变形的资本主义，并未显示出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定势”。夏文经过“正名”，解除了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的区别。经此一解除，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力量不是“微乎其微”了，而是顿时增大了，从而成了历史发展的主线。其实，这一时期，中国共有官僚资本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和民族资本企业三种经济形式。研究它们的性质，实质是包括经营性质和经济性质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就前者而论，根据我们不完全了解，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否认它们的经营方式都是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但后者却大不相同了。夏文之所以认为后者是相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理由就是：“从来不是投资者的成分决定企业的性质，而恰恰是企业的性质逐渐改变投资者的成分。”我们认为则不尽然，中国近代三种企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资本主义性的程度不同，恰恰是由投资者的成分决定的。军用工业主要由清政府投资，因而它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极强，而资本主义性极弱，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清政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军火生产的继续垄断和发展。民用工业掺和进了商股，因而它既具有较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也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它是近代企业由官营到私营的过渡形态。民族资本企业主要是由私人投资，因而它虽具有一定的封建性和买办

性，但资本主义性极强，它是完整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由于它们的封建性、买办性和资本主义性的程度不同，因而它们对历史发展的作用也不同。军用工业在本质上是要维护封建的政治和经济，民用工业是要维护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而民族资本企业则是要争取资本主义的前途。可见，这一时期，它们并未在整体上显示出中国历史发展的“定势”，因而也称不上是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

第三，从 1927 到 1949 年间，被夏文特殊强调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实际上是“微乎其微”，而被夏文轻描淡写的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才占统治地位。夏文认为：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定名之日，也就是解放战争‘外线出击’进行大反攻之时，这种垄断资本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而告消灭。”因此，它在近代史上无足轻重。事实上，1927 年蒋介石南京政权建立后，依靠政治军事力量，在经济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很快就集中了巨额财富，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他们通过筹措内战经费，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地取得了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又通过金融垄断控制了全国经济命脉；并凭借雄厚的金融力量，独占和控制了工业、商业及其他许多经济部门。官僚资本在抗战胜利后达到了最高峰。“解放前夕，官僚资本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官僚资本控制着全国的金融机构和铁路、公路、航空运输以及百分之四十四的轮船吨位，还有十几个垄断性贸易公司”，^①。这正像毛泽东同

① 《社会主义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注释本》第 201 页。

志所指出的那样：“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①。

当然，夏文的这一论点也有一条理由，即“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两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第一次提出国民党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于打倒之列。即由原来的反帝反封建变成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众所周知，早在 30 年代，毛泽东同志就已经提出了“官僚资本”、“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之类的概念。退一步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才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没有关系，因为“名”有时出于“实”之后，但绝不能因为“名”晚出而否定“实”已存在。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两年才把官僚资本主义列入打倒之列，还有策略上的考虑。它既不能说明此前中国就不存在官僚资本主义，也不能说明此前中国共产党就不想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因此，它并不能说明官僚资本主义那时才出现，或那时才占统治地位。

以上可见，资本主义的酝酿、发生和发展并不能作为贯穿中国近代史始终的“一条主线”。

（二）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并不规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

夏文认为：在 110 年的中国近代史里，“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规定资本主义发展和不能顺利发展”。毫无疑问，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夏文的这一观点我们是赞同的。因为在正常的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是同趋同步的，也就是说，政治民主，经济就阔步前进，政治专制，经济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1197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就裹足不前。但是，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能以常例相绳。它的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以后的三四年间，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浪潮。其原因主要有：1.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向中国输出大量“剩余”资本，进一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中国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扩大了，这给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尽管帝国主义的目的是加深中国的半殖民地化，但是，“资本输出总要影响到输入资本的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大大加速那里的资本主义发展”^①。2. 清政府面对外国资本大量倾入的压力，被迫对民族资本作出一定让步。1895年6月5日，清政府以“电旨”方式“飭令招商，多设织布、织绸等局，广为制造”，^②。这项被迫而采取的措施，也为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3. 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刺激一些爱国人士把发展民族工业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手段，因此，民间要求设厂的呼声日益强烈，一些人并由此成了实业家。可见，这次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小小浪潮，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关系。

不仅如此，在更多的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还表现为相反相悖的关系。如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较快的两个时期就是如此。对此，我们运用夏文的材料来说明。夏文指出：“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投资总额达到8亿余元，又是1913年的百分之一百七十以上。”“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经济

《列宁选集》第2卷，第78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光绪朝东华录》（合订本第4册，总第3949页）。

亦有所发展，据很不不完全统计，1933 年投资总额表面为四亿余元，实际远不止此数，因为三十名雇工以下和不使用机器动力者未统计在内。”对这些统计数字我们没有疑义。但这两个时期的政治情况怎样呢？这两个时期正是北洋军阀统治和国民党统治的初期，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政治气候无疑不利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夏文也承认，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对企业的摧残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程度”。既然经济发展和政治黑暗反差如此之大，又怎么能说在 110 年的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与民主政治同趋同步呢？因此，实现民主和反实现民主并不规定资本主义发展与不能顺利发展。

（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斗争所争取的民主本质不同。

夏文认为：“戊戌变法的伟大意义还在于，它是为实现全面资本主义化也即为资本主义社会而斗争的开端。从戊戌变法以后直至 1949 年解放战争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2 年间的一切斗争，可以说都是为了实现戊戌变法开其端的民主与独立这一步。”对此，我们也不能苟同。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的核心是设议院、定宪法、行民主，最终要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因此，如果说辛亥革命所追求的民主是对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的发展，那尚珠联璧合；但如果说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民主也是对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的发展，那就风马牛不相及了。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现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它在政治上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反对把中国造成资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阶段，是为了终结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一个过渡的阶段，是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①。因此，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革命战争所争取的民主根本不同。

诚然，夏文对此也作了总结性的说明，即“既是它，又不完全是它；说不完全是它，却又正是它”。但是，讨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关系，实质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问题。那么，夏文这里是指形式还是指内容呢？夏文并未明确指出。我们认为，戊戌变法所追求的民主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形式相同，内容根本不同。因此，如果用夏文的语言方式，我们倒认为：“形式上是它，内容上根本不是它；说内容上根本不是它，形式上却又是它”。

二、对 110 年中国近代社会的纵向立体考察

要正确解决 110 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就必须对 110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有一个贯通立体的把握。毛泽东同志早在 1940 年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610~61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经济的集中表现'^①。这一论述告诉我们，要贯通立体地把握整个社会系统，就必须研究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动态过程。据此，下面我们对近代社会的经济基础、阶级结构和思想文化作一番纵向立体考察，以作为我们解决 110 年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依据。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的经济发生了变化。40 年代，面对外国商品的侵入，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个体的分散的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极端低劣和停滞”^②，终究抵挡不住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大生产。50 年代，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了。其表现是：家庭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各种手工业部门衰落，农产品商品化发展。这一切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60 年代，清政府投资于军事工业，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企业。它们虽然带有极强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却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开拓了道路。70 年代，民族资本主义开始产生，以后并得到了缓慢的发展。但是，直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中国的自然经济还仅仅处于解体过程，在广大农村和全国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它还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在它庞大躯体的某些溃败处所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还相当弱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仅有军用工业 20 余家，民用工业 20 余家，民族资本企业 130 余家。两者相较，前者犹如汪洋大海，后者仅是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小岛。因此，这一时期是封建经济统治和瓦解时期。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一致，阶级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除原有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外，又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624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161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在这一时期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只是早期的和自在的阶级，并未登上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上搏斗的仍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农民阶级为了生存，几乎是连续不断地举行起义。如1842年的钟人杰起义，1851年的太平天国起义，1860年的朝阳起义，1866年的崇安起义，1878年的琼州起义，1890年的余栋臣起义等。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农民起义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开展洋务运动的初衷也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思想变化和经济、政治的变化是同步的。这一时期，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其思想理论界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裁厘”“加税”“行商战”“设议院”的主张，但它们仅仅是个人意识，并没有转化为群体意识，更没有发展成为社会思潮。农民阶级虽然是对封建统治进行武器批判的勇士，但他们的批判武器却没有新思想新理论可言。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地主阶级的思想。大致说来，从1840到1860年间，以整顿漕运、盐法、河工、兵饷“四大政”为主要内容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从1860到1895年间，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影响较大。可见，从1840到1895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确实发生了变法，但这种变法并没有越出中世纪的框架，其主体仍属于封建主义的范畴。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中国影响极大，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全盘的但却是逐渐的革命化，意味着大工业和铁路等等的发展使农业和农村工业之间的旧有联系瓦解”，^①。的确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88页，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合法化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另一方面，由于大家熟知的原因，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初步发展。从 1895 到 1898 年，出现了投资设厂的第一个高潮；随后，从 1905 到 1908 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设厂高潮。结果，从 1895 到 1913 年全国共开设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厂矿多达 549 家。从 1914 到 1918 年，中国的资本主义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据统计，从 1912 到 1919 年的 8 年间，新增资本就达 1 亿 3 千至 4 千万元，等于或超过以前 50 年的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资本主义由发展转向停滞。这从新建厂矿的数量逐年减少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农商部注册的新建厂矿，1920 年为 70 家，1921 年减为 61 家，1922 年减为 46 家，1923 年减为 14 家，1924 年则只有 11 家了。1927 年南京政权建立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不断恶性发展，民族资本则每况愈下。可见，从 1895 到 1927 年，虽然在数量上封建经济还远远超过资本主义经济，但资本主义以异军突起之势出现在经济舞台上，并日益影响社会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因此，这一时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停滞时期。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社会的诸多矛盾中，资产阶级和封建专制统治的矛盾日益凸现出来。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展开了一系列争民主、争独立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和武装斗争。如 1895 年的“公车上书”，1898 年的“百日维新”，1907 年开始的“请愿运动”，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3 年的“二次革命”，1915 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7 年的“护法运动”，以及由无产阶级参与领导的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对此，先是清政府后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此从

广义来讲，在政治领域里，这一时期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只不过这个革命走的是一条先上升后下降，即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最后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马鞍型路线。再看看思想文化领域。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和北洋军阀谁也没有拿出像样的思想武器来和资产阶级对垒，处处呈现出节节败退之势。而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民主共和及民主科学的思想，则一浪高过一浪，成了席卷全国的思想潮流。可见，从 1895 到 1927 年间，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已突破了封建主义的框架，资本主义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旋。

1927 年，是 110 年中国近代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年份。在这一年里，一方面，蒋介石背叛革命，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并在南京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政权；另一方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正确道路，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把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付诸了实践。这样，从此开始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和思想文化状况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

从经济领域看，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历史车轮共碾出了三道轨迹：一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二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当然，这三道轨迹并非互不相涉，而是尖锐对立，斗争炽燃。官僚资本主义代表着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它既要摧残、压制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又要扼杀新民主主义经济；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首先遭到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反对，加之自身的脆弱，发展起来十分艰难。新民主主义经济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指引

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经济。对此，毛泽东同志在阐述红色区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时曾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①。其中，“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个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②。可见，新民主主义经济有三个特点：一是国营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导和核心；二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是包括 5 种经济形式的复合体；三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部分。这里顺便说一下，正是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第三个特点，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里，才“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但是另一方面又是替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扫清道路是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发展资本主义是一种客观要求，而不是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这样，从宏观来看，这一时期中国主要有两大经济形态：一是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一是新民主主义经济。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前者虽然极为猖獗，甚至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但由于它代表最反动、最落后的生产关系，因而它是注定要失败的。事实也正是如此，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便土崩瓦解了。而后者虽然幼小，但它代表着最先进、最进步的生产关系，有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119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第 132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因而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萌芽破土，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壮大，伴随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进一步扩展到全国各地，最后取代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胜利。因此，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经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历史发展的主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时中国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经济支撑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一是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正像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的：它“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是旧民主主义的共和国，那种共和国已经过时了；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那种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已经在苏联兴盛起来，……但是那种共和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还不适用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因此，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国家形式，只能是第三种形式，这就是所谓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两种政权之间进行了殊死的斗争。如从 1930 至 1934 年的五次围剿与反围剿；红军长征途中和到达陕北后的围剿与反围剿；8 年抗战虽是一个特殊时期，但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没有完全停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三年解放战争，经过战场上的殊死搏杀，最后，这对矛盾以国民党败逃台湾，共产党解放全中国而告终结。可见，在这一时期里（除特殊阶段），这对矛盾不仅贯穿始终，而且还影响和制约着其他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在这一时期，在政治领域里，是完整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一时期，随着经济结构和政治态势的变

化，思想文化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为了维护其反动的经济关系和政治体制，但又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思想武器，只好大肆贩卖法西斯主义，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围剿。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采用高压和恐怖的政策，禁止进步书刊发行，据不完全统计，1929 年到 1935 年在社会科学和文艺方面被查禁的进步刊物达 1000 余种，封闭进步书店，破坏进步文化团体，迫害进步作家，并唆使反动文人攻击、破坏左翼文化运动。这种反革命文化围剿时缓时激，一直延续到国民党彻底垮台。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却像“离离原上草”一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翼文化运动的兴起，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文化的发展，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文化的繁荣。反映到思想领域里，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进一步深化，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深入人心。可见，从 1927 到 1949 年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历史发展的主旋律。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近代社会并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而只有一条由三个不同线段连接而成的主线，即封建主义的延续和衰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停滞→新民主主义的产生、发展和胜利。当然，这里所说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都不是单纯的政治范畴、经济范畴或文化范畴，而是包括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在内的综合范畴。

三、110 年中国近代史的分期

通过以上对 110 年中国近代社会的考察与把握，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对这个问题论述较早、